

全球正义：21世纪中国的道德领导角色

只有当你的想法有吸引力，并且确实符合道德观念，其他人才会尊你为道德领袖

专访 | 涛慕思·博格 政治哲学家、耶鲁大学教授

财新《中国改革》记者 | 刘芳

涛慕思·博格 (Thomas Pogge) 的中文译名很特别，常见的音译“托马斯”被译为字字皆有含义的“涛慕思”，颇见得他一贯在智识上的追求。这个在幼儿园时期就被同伴们戏称为“教授”的德国人，自小便希望在学术上有所成就。他30岁获得美国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先后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和耶鲁大学，并在挪威、英国、澳大利亚的四所大学担任教职。

学术之外，他的另一志向是，消弭世界的贫困与不公。十四五岁时，他因政府减少了储蓄补贴的金额而去电台投诉。节目播出后，姐姐打电话来，称赞他小小年纪便关注公义问题，他却觉得糟透了：“世界上有那么多不公的事情，而我打电话给电台投诉，只是为了自己的一点点钱！”此后每一次争取公义，他都会自我警醒，不可出于私己的理由。

博格出生于1953年，越战是这代人年轻时绕不过的话题。尽管美国击垮了纳粹、解救了德国，曾是博格心中的英雄，但美国从空中直接向越南投掷燃烧弹的行径，令他义愤填膺。高中时期，他便组织全校游行，抗议这赤裸裸的不公。

1980年在亚洲的旅行更加深了他



涛慕思·博格认为中国需要表现出更强的道德领导力。

图片来源：耶鲁大学“健康影响力基金”官方网站

对世界不平等的体认。他花了三个月，遍访土耳其、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国、泰国、韩国、日本——最感兴趣的中国，那时无缘得入。沿途的状况让他心痛，尤其加尔各答绵延几公里的贫民窟里，人们食不果腹，而他用一美元就能买64根香蕉，给饥饿者分食。这让他开始思考：“为什么我们不能做点事？这个世界显然应该以某种方式组织起来，让每个人吃饱饭，过一点体面的生活。”

带着这些诉求，他学习了大量关于经济公平的课程，又师从罗尔斯学习政治哲学。罗尔斯是20世纪最有建树的政治哲学家，他出版于1971年的《正义论》影响无远弗届。

从罗尔斯那里，博格终于找到将人生两种志向合二为一的方法：此前，他本想效仿乔姆斯基，以不同精力分别投入学术与社会活动。他甚至比罗尔斯走得更远，将老师在一国范围内适用的正义理论，置于国际架构之上，成为“全球正义”理论重要的创始人和推动者。30年来，他在全球40多个国家演讲，呼吁发达国家为消除全球贫困承担应有的责任。第1000场演讲，刚刚于上月底在北京大学落幕。

2013年5月31日，美国耶鲁大学全球正义研究中心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学院共同举办了“全球正义：中国在21世纪的道德领导角色(Global Justice:China's Moral Leadership Role in the 21st Century)”学术研讨会，博格担任学术主持。他认为：随着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国际影响力逐渐增强，中国需要表现出更强的道德领导力，这对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帮助建立一个更加正义的世界至关重要。

做规则制定者，而不是接受者

人们期待听到中国对未来的想法和建议：“你们怎么想？你们希望发生什么？”

财新《中国改革》：“全球正义：21世纪中国的道德领导力角色”，为什么会设置这样一个议题？

博格：有两个不同的理由。一是，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经济发展极其迅速，各界因此期待中国能在全球机制的发展上承担更大的责任。人们期待倾听中国的声音，期待听到它对未来的想法和建议：“你们怎么想？你们希望发生什么？”但是，这与中国的实际状况之间尚有差距，中国有必要去满足这种期待。而且我认为，中国政府一定程度上得去满足这种期待。另一个理由是，对所有像我一样关注全球正义的人来说，如果中国能成为全球正义的一部分，会是一个机会，一种新的希望。想想看，一个新的大角色要加入进来，参与人权或人类未来的国际对话。人们会希望，中国成为世界人口中穷困的那一半的利益代言人。

财新《中国改革》：为什么选择了“领导力”这个词？你认为中国有能力承担这样的使命吗？

博格：现在还没有。但当你谈论能力，你需要意识到有一种母能力，也就是学习其他能力的能力。比如你现在不会法语，可是，你有学法语的能力。中国政府同样如此。中国肯定有能力做一个道德领袖，但不可能今天说了明天马上做到。如果你有武器，有强大的经济实力，

你可能很容易成为一个领袖。但要想成为道德领袖，你需要思考，提出你的想法和建议。只有当你的想法有吸引力，并且确实符合道德观念，其他人才会尊你为道德领袖。因此，什么样的想法符合道德观念，是中国必须思考的问题。这不仅关乎中国是否会有一个美好未来，也关乎世界的未来。

此外，眼下中国正在与美国和欧洲竞争。欧美在争取成为道德领袖的过程中表现得非常机智，起码他们都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宣讲。国家间的竞争不仅限于军事和经济方面，也应该体现在道德领域，例如关注气候变化、贫困、安全、技术发展等等。中国应该知道如何应对这些问题。

财新《中国改革》：这是你认为中国应该做的，但中国的实际表现如何呢？

博格：眼下中国还是倾向于跟随，让美国和欧洲来决定规则。中国主要在做两件事，一是，在表面上遵守并坚持这些规则——经常是西方制定了规则，中国不喜欢，就会说：“不，这些规则是你们想要的。”但又不提出自己的规则；二是，非常聪明地利用已有规则。比如，上世纪90年代，世贸组织准备来打开市场，中国说：“如果你们这么希望，我们会保护知识产权。但我们会做得比你们更好。20年内我们会比你们有更多的专利。”那时，中国没人尊重知识产权，所有人都在盗版图书、音乐、电影。但是，现在中国在知识产权方面已经是一个大赢家，利用知识产权从其他国家赚了很多钱。所以，中国是很有适应性的。但它依旧不是一个规则制定者，而只是一个规则接受

者。我希望中国改变这种状况。规则非常重要，你不能简单地忽略规则制定，把它留给别人。因为从长远来看，如果你让别人来塑造世界，只会使你自己的成功变得更难。所以，你必须竞争。不单凭借硬实力竞争，更须倚靠论证完整、有效的想法和观点。

究竟每个人承担多少责任才公平

游戏每个人都有得玩，尽管有时候它不像你希望的那样分配

财新《中国改革》：根据你的理论，全球正义是关注国际间的规则及其给不同的人群造成的影响，并要求各个国家承担起由于其发展消耗的资源而应有的责任。可否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比如你认为最近哪国的状况或哪个国际事件应该被置于这一议题之下？

博格：比如在贸易领域，一个例子是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MDGs）的后续计划（这个项目中国没有参与太多，好像也不怎么感兴趣）。2000年联合国通过了“千年宣言”，以期消除贫困。他们制定了一系列目标，规定在2015年前完成。现在这些指标即将完成，所以他们在制定新的15年目标，即2015年-2030年的计划。我和我的伙伴们最近非常忙碌，希望能影响这些新目标的决策。

我们有更宏大的目标，其中之一是，希望能制止国际间的逃税行为。逃税之数量庞大已经对发展中国家造成了严重损害。中国恐怕是其中最大的受害者——官员和商人的腐败，使中国遭遇了大量货币外流。这些钱被带

到国外，存入秘密银行账户，以逃避税收并洗钱。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在因此遭受损失，全球每年因此损失1万亿美元，也就是约6万亿元人民币。眼下正是将这个话题提上国际议程的最好时机，因为在这一轮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所有政府，包括富足的政府，都迫切需要资金。这是全球正义的一大话题——中产和中产偏下的阶级交税，富人们却坐享其成，他们在这种“国际合作”中逃避了应有的责任。

财新《中国改革》：那么，是否需要一个世界政府或者世界组织来具体实施这些目标？

博格：不需要传统意义上的世界政府，就是说类似于国家一级的政府，比如“世界议会”和“世界行政部”。但是，当然需要机构来监控和贯彻国际间制定的规则。而这些我们已经有了：世贸

组织……如果其他国家一起施压：“到此为止！你们不能再提供秘密银行账户让富人逃税了！”这些避税天堂小国就会很快遵循规则——它们必须遵守。它们太小而无力抗拒。新加坡也许是最难施压的，但瑞士已经同意了多项改革。即便是新加坡，经济实体也不大，如果其他国家联合起来说，“不按规则做，我们就没收你的海外投资。”新加坡也将毫无办法。所以，不需要世界政府，但确实需要共同执法。

财新《中国改革》：如果没有强力执行机构，全球正义目标的实现，恐怕要依仗大多数国家自觉自愿接受这个共识。如何能达到这一目标？尤其像中国国内目前价值观如此多元，如何能通向这一共识？

博格：中国在统一内部意见方面是有优势的。难题在于，有些官员们有两

人们可以竭尽所能让自己的国家繁荣、强大、独立，但所有这些只能在正义允许的范围

种利益：他们希望中国有钱，有税收；但同时他们也希望自己能钻空子，能逃税。这是真正的问题。现在，美国特拉华和内华达两个州，可以提供秘密银行账户，他们会游说欧洲人来这里逃税。在瑞士、英国也有这样的勾当。但是，这是一个输家的游戏，因为尽管他们能通过吸引资金赚一点钱，可别人也在吸引走他们自己的纳税人，这带来的损失要大得多。所以，人人

组织、联合国及其子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你可以说这些机构就是宽泛意义上的世界政府。它们的作用将会在未来变得更加重要。当所有国家联合起来，可以对不遵守规则的单一国家施压。拿逃税的例子来说，恐怕全球有60个避税天堂，瑞士、新加坡、巴哈马、百慕大、根西

涛慕思·博格——

全球正义：21世纪中国的道德领导力角色



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的“全球正义”理论学术研讨会现场。

都是输家。一旦人们认识到这个道理，要解决这个问题就不难了，即便各国都有自己的价值观和想法。毕竟各国都需要资金支持，没人愿意输钱。现在真正的麻烦是，富人能买来政策。在美国正是这样，富人们去华盛顿，对政客说：“我们不想交税，减免一点，给我们留个空子。”

财新《中国改革》：针对避税的问题，也许政府愿意配合，这毕竟是在经济上有利的。但是，中国还有其他很多问题，比如法制、教育、环境。你认为在这些议题上，中国能否达成共识

并承担相应责任？

博格：以环境污染为例，显然我们需要共识，需要协作，每个人都有责任。你不能指望中国独力完成。如果全球合作，单个政府会愿意承担更多。比如我问你，你愿意为消除世界污染做些事吗？你会说：“嗯，我会做一些，比如回收瓶子。”不太多，因为你做的事无法带来大的改观。但是，如果我说：“如果其他所有人都愿意以你为榜样，你会做什么？”你就会说：“那我会做更多。因为如果我回收一个瓶子，就意味着有60亿个瓶子被回收。”我们要充分利用这一点：人们在集体协作状态

下愿意做更多。

这里的一大障碍是责任分配——究竟每个人承担多少责任才是公平的。比如，中国人会说：“美国要承担更多，因为他们已经污染了那么久。”而美国人会说，“不，不，我们从今天开始算，只看未来。”这些谈判很难，需要坐下来共同讨论，最终也许能达成妥协，“好吧，我们从1990年开始算。”很难说什么样的妥协是正确的，你得实际去跟人谈判。但如果能达成共识，我们都是赢家，这是不言而喻的。游戏每个人都有得玩，尽管有时候它不像你希望的那样分配。

国内正义与全球正义可相互补足

你的资源是什么，在国内可以分配什么，取决于你对国际的责任

财新《中国改革》：全球正义与一国之内的国家正义是什么样的关系？两者的要求发生冲突时应该如何选择？

博格：我想两者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独立的。中国对其他国家有一定的义务，当然，这建立在其他国家也兑现他们的义务的基础上。以家庭为例，你要对你的家庭成员负责，对外也有一定的义务，比如你要交税，或者你从银行、亲戚那里借了钱需要还债。这时候你说：“哦，现在对外正义（还债）和对内正义（养小孩）之间有冲突……”可是欠的钱终究是欠的钱，你必须偿还，在这之后剩下的钱才真正属于你，才可以用于国内正义。比如有人说，“我们可以派军队去占领朝鲜，抢他们的钱，更好地用于我们的国内正义。”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对吗？你不能为了有更多国内正义而对国外不公，不能因此伤害他人。国内正义也并不是让中国人共同富裕，而是要公平地分配资源。你的资源是什么，在中国国内可以分配什么，取决于你对国际的责任。所以，我看不出有任何冲突，因为在这些情况下，不伤害外国人的国际义务优先。

财新《中国改革》：但也许有人会认为，如果中国政府将更多资金投入国际事务上，会与国内经济发展有一定冲突。

博格：是有冲突，但我的意思是两种立场的冲突。我们必须记住全球正

义主要是关于全球规则。中国在这件事上有两种立场可以选择，一种是，“我们希望这些规则尽可能对我们有利。别管什么公平正义，我们只想要利己的规则。”这正是美国以前做的事情：“我们需要对我们最好的规则。如果我们的公司从开放市场中获利，那就开放市场；如果我们的公司从封闭市场中获利，那就支持贸易保护主义。”还有另一种选择：“我们想要公平的规则，不只对中国有利，也对世界上每个人有利，对后世有利。”我想后者是中国应该采取的立场。如果中国选择做强权，“我们辽阔，我们强大，我们富裕，我们只要对我们最有利的规则”，中国确实有自己的优势。但这不是国内正义，也不会增加国内正义，只能增加国内财富。财富的增加不能使一个国家变得更加公平正义。

财新《中国改革》：用你刚才家庭的比喻来说，也许问题在于，人们没有意识到这种责任是“欠下的债务”。

博格：如果政府说，任何我们能从国际体系中拿出来的钱都是我们的，那么，你想要侵略朝鲜吗？我觉得这个例子很明晰。中国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在抱怨苏联，说苏联是霸权，那么中国想做苏联吗？或者像美国一样，在全世界四处派兵，滥用武力？我觉得这不是中国官方的态度。我想中国政府明白哪些是合法的，哪些不是。当然，如何清晰区分二者，是比较困难的，有时候界限比较模糊。正义不单是遵循法律，还包括不伤害那些无力捍卫自己权益的弱势群体。

财新《中国改革》：所以，我之前问到

国内正义与全球正义的关系，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不能代表人们的利益，法律本身就不够公平合理，那么建构在这个“国内不正义”的基础上的国家，能担负“全球正义”的责任吗？

博格：我把这种状况称为竞争，而不是冲突。我们的资源有限、时间有限、精力有限、政治可能性也有限，很难说在什么问题上可以更有效，也许保护弱者免受国内的不公正更有效，或者保护人们免受国外的不公正更有效。这很难判断，但我认为两者都很重要，而且任何一方的斗争都会帮助改善另一方，因为这让正义和道德的观念在人们头脑中变得更坚固和重要。

财新《中国改革》：国家主义，或者说极端的国家主义思潮，目前比较流行。这对实现你期待的世界主义是一种障碍吗？

博格：可能会是，这取决于你如何定义国家主义。你可以是一个国家主义者，可以说：“我为我的国家而活，我希望它蓬勃发展。但同时我也希望我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上做到公正，永远不会侵略朝鲜，即便那有利于我的国家。”没问题。但如果你是一个极端的国家主义者：“如果朝鲜有钱，当然要侵略！”这就是问题了。

你知道我来自德国，上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德国的法西斯主义者们也非常爱国，他们说，“我们爱德国，我们要帮它壮大。所以我们要趁机扩大，拿下法国，攻下波兰，占据一部分俄罗斯……”这种极端国家主义者的存在，确实会带来冲突。但我希望没有那么多这个意义上的极端国家主

义者。要清楚的一点是：人们可以竭尽所能让自己的国家繁荣、强大、独立，但所有这些只能在正义允许的范围内。

在美国，存在另一个维度的“爱国”。我在全球40多个国家演讲，人们的接受程度各不相同，但最难的就是在美国。美国人的政治倾向大多偏右，对新的想法非常保守。他们也很爱国，他们会说：“我的国家是伟大的。如果我的国家这样做，它肯定是好的、可信的、正确的。”他们没什么批判精神。说服美国人需要很大的精力，因为他们从小就被教育崇尚自己的国家，这远远超出在中国的状况。在中国，当你长大，想法会改变，一些成年人会知道中国也有很多问题，政府也有很多问题。但是在美国，虽然没有官方宣传，或者说没有那么多，许多人却真心认为美国是如此美好和特别：“是的，我们有个小问题，但我们仍然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从文化的角度，美国从没让我感到身在故乡，在那里我总觉得自己是一个异乡人。

“健康影响力基金”将是首选

不是在指责中国政府，而是在教中国人认知贫困问题的正确方式

财新《中国改革》：你最近在致力于什么项目？

博格：同时有几件事。首先是一个大规模的打击非法资金的运动，主要针对秘密银行、避税、滥用税收等行为。另一个是关于医药方面的。我在尝试建立一个新的奖励机制，以鼓励医药创新。过去是发明者申请专利，可在

药物被采用的头20年收取高额费用。我想改变这种情况，我认为奖励应该基于药品对民众健康的影响：在新药投入使用的头十年里，药品使人们越健康、越长寿，医药公司就可以越赚钱。但公司必须以生产成本价出售药物，让穷人也负担得起。我们正尝试把这种想法试验于某个国家的某种药品上。这个项目被称为“健康影响力基金”（Health Impact Fund）。

另外我们刚刚完成的一个项目，是对贫穷及性别不对等的评估，即如何衡量贫穷。世界银行也在做类似的事情，但做得很糟糕。我们有更好的想法。我们曾到六个贫困国家做了三轮实地考察，与穷人交谈，试图找出衡量贫穷的最重要的标准，以及在不同程度的贫困中评估的方法。

财新《中国改革》：现在中国有没有你们的项目？或者你认为什么项目是中国应该参与的？

博格：还没有。我们有一个组织叫做 ASAP（Academic Stand Against Poverty，学术对抗贫困），目前在十个国家有分支机构，但在中国还没有。这项工作在中国很难进行，因为我们永远不知道中国政府的意愿如何。也许政府会认为：“我们已经在解决贫困，不需要别人插手。”但是，我想许多中国人会希望加入这样的组织。我知道四川地震发生后，很多人亲赴四川、自发捐款。中国人其实对这类事情很有热情。但我并不想让任何人惹上麻烦。所以可能需要事先与政府讨论，让他们明白我们在做什么。这会比较困难。ASAP 可以做的是，向中国人传递世界

的信息，比如“千年发展目标”及后续计划，让人们了解在别的国家乃至全世界是如何抗击贫困的。这样做是可行的，你不是在指责中国政府，而是在教中国人认知贫困问题的正确方式。但关键在于，我需要中国真的有人去做，愿意和其他国家的 ASAP 合作，以上这些才有可能发生。而对此我并不确定。

财新《中国改革》：你觉得中国目前最需要的项目是什么？

博格：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要考虑的不只是项目收效，还有在政治或其他方面的可行性。

在我看来，中国当前最大的问题是腐败，这一状况日趋严重。我每一次来都有这样的感受，这对中国的未来会是一个巨大的威胁，社会规则正因此变得支离破碎，经济也会放缓。这个问题急需解决。但是，从政治上来说，反腐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因为当局并不愿意真的承认现状。所以很难对它有所作为。

我希望的还是中国政府能够参与“健康影响力基金”这个项目。中国有许多严重的健康问题，我们可以尝试用降低药品价格、奖励药品疗效的方法来解决。设想一下，公司的回报将基于他们能带来的效果，这会是一种了不起的新举措。中国可以在本土做这种尝试，也可以在国外实践，比如在非洲，由政府出资和支持。如果中国政府愿意合作，这将是我的首选项目。■

本文得到台湾中正大学谢世民教授鼎力支持，特此感谢

财新《中国改革》实习生王歆慈对此文亦有贡献